

汪向荣^①

地点：北京小雅宝胡同家中

时间：1995年4月23日至1995年5月5日



汪向荣

①汪向荣，中日关系史专家，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1920年生，上海市人。1940年到日本留学，1942年回国，后又赴日，于1944年回国。1984年主持成立“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出版有关专著12部。

钟：请您谈谈您过去在日本生活学习的种种情况。当年您为什么去日本？怎样去的？

汪：行。我也希望能有机会讲一下，不过，抱歉的是，有些事情在今天讲还是早一点，请原谅。

我在1940年8月30日从上海出发，9月1日到达长崎。那时，正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上海、南京全在它的铁蹄下。那时我还年轻，在上海复旦大学教育系读书，陈科美是系主任。我为去日本考虑了一年左

右，当时上海有一句话，叫做“过桥”。桥就是外白渡桥，当时桥这边是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过了桥就由日本控制了。我们中国青年当时是连过桥也不愿意的，我在上海住了多年，就是没有去过一次，可我去了日本。这话就得从头谈起了。

我是上海市人，生在上海，念小学、中学、大学。当时我们受的教育，在日本人讲，叫做抗日教育；我们讲则是正常教育，讲日本侵略中国，“五卅”、“五七”等国耻纪念日有活动，每周一的纪念周会上也讲，我们对日本没有什么好感，明白日本人在侵略我们。不过，日本人不一定都是坏人，因为我1910年去世的曾祖父，去世前是江苏布政司，这以前是从京师法政学堂调去的。学堂是在现在北京西单北边一点，是培养高级官吏的学校，他任提调。校内有日本老师，像杉荣三郎、矢野仁一、松本龟次郎^①等人，日本总教习是岩谷孙藏，他是清政府法部顾问。我没有见过曾祖父，我祖父对我说过：“曾祖父讲过：‘日本人啦，并不完全都是坏的，那些法政学堂的老师就很好。’”我就逐渐形成一种看法：日本明治以前对中国很好，明治以后才侵略中国。究竟日本是怎么一回事？就很想去看一看。我这个人从小就是这样，不是自己看到的，总是不太相信。

到“九一八”^②时候，我参加了一次学生游行，那时我已经进上海中学。这样大规模的游行，恐怕是上海历史上头一次。我们到务本女子中学集合出发，绕旧的上海城和租界交界的中华路和民国路走了一大圈。我记得那时教育局长是陈德征。我们不但参加了游行，还去抵制日货，到铺子里找出日货来，牙粉、

^① 松本龟次郎（1866—1945），日本教育家。1908年到北京任京师法政堂教习。1914年创办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培养中国留日学生近30年。

^② 九一八，即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国东北的事件。在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开始发动，此后整个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

布什么的，拿来烧掉。我们都参加了，年轻的老师也参加。我在1980年回母校还见到过陆人骥老师，他那时刚从中央大学毕业也和学生一同参加了。当时上海中学是南方最好的中学，与北方的南开中学齐名，校长是郑通和。学校里不学日文，只学英文。

到抗日战争开始，“八一三”^①，我刚高中毕业，我们可以直升复旦大学，不用担心考试。当时有些同学都去救护队帮忙，我正好认识一个，是东南医学院秘书长，姓许，他们有救护队。我就问他要不要人？他说：“可以，你来吧。”这样，我就和另外一个同学，一同参加东南医学院医疗队。我们没有到最前线，可也差不多了，我们救护队在江湾的立达学院，每天早3点左右就到前线去，离前线不过200米左右。我不懂医疗，伤员来了，抬担架，包扎一下，抬下来送到临时包扎所。我们前面是第5军88师，老百姓支持很踊跃，卡车什么的都有。我们晚上回立达学院休息。我们在立达也挖防空壕，有一次挖出一批日文书，后来知道大概是朝鲜学生离开时埋的。

不久日本军队在杭州湾登陆，我们被包抄在里面，不得不退。我们跟88师往后退，过苏州，到无锡。东南医学院一些同学就同我们商量，说老退不是办法，要回上海去。我老家在青浦，退时经过，亲戚也劝我留下。当时我们狼狈不堪，救护队也是东西丢光。日本兵还没有到无锡，大家决定与88师分手，想办法回上海去。大家不敢沿铁路线走，从地图上看，找了条去吴江的公路。我们到了吴江，大家分散了，有些人冒险乘船，

^① 八一三，即八一三事变，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又在上海发动的侵略战争。8月9日，日本官兵两人乘军用汽车向虹桥飞机场猛冲，被中国守军击毙。8月13日晨，日军即以此为借口，对闸北、虹口、江湾一带发动大规模进攻。从此，中国人民进入全面抗日战争阶段。

一人一个袁大头，可以送到上海。我在亲戚家住两天，又到朱家阁住了个把月。亲戚叫人领我，躲过虹桥日本兵哨口。我从那里回到了青浦，找了个大米贩子，跟他们走。一清早天不亮就动身，6点钟到虹桥，有日本哨兵，我们绕后面过去，到徐家汇，我就认识路了。我一共花一块光洋。

我的家在法租界，八仙桥，大世界附近。我父亲是1914年左右从龙门师范毕业的，以后在一个模范小学教书，工资按年加，抗战开始时已经每月120元左右。我有两弟两妹，父亲负担也重，打仗了，学校停了，他一月只有30元左右，粮食也贵了。家里决定母亲带小的回青浦，我留在上海，想找点工作补贴。当时中学、大学很少开学的，我是到1938年才回到复旦大学的留在上海部分，在北京东路。1937年底，回到上海我就设法找工作，我到业余学校教过书，以维持家中生活。有一次我在外国人办的报纸编辑部，看到过日本军人在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是120一半大的照片。我问当时报馆的编辑，他说是花了大价钱，从南京买来的，是日本兵自己照的像，拿到中国照像馆冲洗，照像馆的人偷偷多印几份，卖出来的。我看后很气愤，照片上有妇女赤身露体和被杀的人。我在战后听审判战犯时，日本人说不说没有证据，我觉得很奇怪，这些照片怎么没有了？我是见过的。

当时我也时常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上没有不结束的战争，两个国家之间，今天是朋友，明天也许就是敌人，可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书本上讲日本很早就是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国家，难道日本就是世仇吗？这一点我在复旦学习时和别人聊过，我总觉得，日本人不应该这样，应该是同中国人一样。当然打仗死人是免不了的，中国过去军阀打仗也死人，但日本人到中国这样大规模地奸淫烧杀，简直是没有人性的。当时我们在上

海的中国青年，有两条路：一条是到重庆去；一条是到八路军去。没有一个年轻人跑到南京伪政权去，去的只有老北洋官僚的那些人。我们都拿过桥作为耻辱，只有小商人跑来跑去。

1938年后半年我在复旦上学，还需要工作挣钱，以在生活上补贴家用。经过我的小学老师章启东介绍，到褚民谊家当家庭教师。章同褚民谊相熟。褚当时是国民政府在上海的代表吧？他家在法租界，陕西南路跑狗场对面，中国科学社附近。章老师对我说，褚的大女儿在初中一、小女儿在小学上学，需要补习英文，问我能不能教？我说我可以教。这样我从1938年9月开始，到他家当家庭教师，待遇较优越，一天一两个钟头，一直教到1940年，这两个女孩子当时都在中国中学和小学上学。我拿到钱，不但我自己能维持生活，还能供应弟妹费用了。在1938到1939年，我又到我的中学化学老师办的应用小工艺训练班教书，是做洋蜡粉笔等小轻工业品的班，很简单。我参加办班当老师，那时，进来学的人杂得很，有的连一般化学知识都没有。我就编了一本教材，不照一般化学教科书体制，强调实用，后来由世界书局出版，叫《化学纲要》，大约在1939年出版，我拿到了版税。

我在褚家认识一位戴策，他是留法勤工俭学的一员，湖南人，战前在政府当科员，褚民谊的部下，他同西药厂一批老板相识，他们有一个计划，想在战时到昆明一带后方建个药厂，他们筹集了一笔钱做建设基金，成立生产建设协会，后来看看战争对中国不利，一时建不成厂，商人对投资没有把握，钱就留在上海。戴策就是负责这笔钱，他觉得这笔钱要有个用途，要不没办法对股东交代，他就跟我谈起来。我说我在应用化学班教书，写的书对生产建设有关系，能否把讲义集中起来，再加一点就可以出版？他觉得这主意不错，就去同陆高谊谈了，陆

是世界书局总经理，也满口赞成，说在上海销路一定好，叫我赶紧整理出来。我就把我写的整理出来，又从英文《大众科学》中翻译一点，一共编成5本书，叫做《生产建设丛书》，世界书局很快出版了，1939年上半年就出了，卖得也好，夏天我就拿到头一笔稿费有200块钱吧，那时可不少了，我很高兴，拿给家里。《化学纲要》反倒是先交稿后出书。

1939年夏天吧，汪精卫到上海，褚也参加汪的活动，戴策开始没有参加。我则想去日本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我同戴策谈了我的想法，戴说：“你要是想日本人会要和平，那是梦想。不过，你要是想去看一看，读些书，那是可以的。”戴策后来还是当了汉奸，在伪国民政府里职位相当高。他还一面经商，伪政府垮台后，听说立即跑到香港经商去了，后事不知道了。我同褚有次也谈到和平问题，他说：“我是看不到了，你们年轻人尽力而为吧。不过，对日本人的话不要太相信了。”他到南京后，日本人送他两只小狮子，他就拿来玩，狮子长大才送给中山陵农业试验场。他还练太极拳，还踢毽子，他曾叫我翻译过一点踢毽子的资料。1939年下半年他一人搬到愚园路去住，我还到老地方教课。教数学的是中法工学院姓林的老师，福建人；教语文的姓高，后来当了褚的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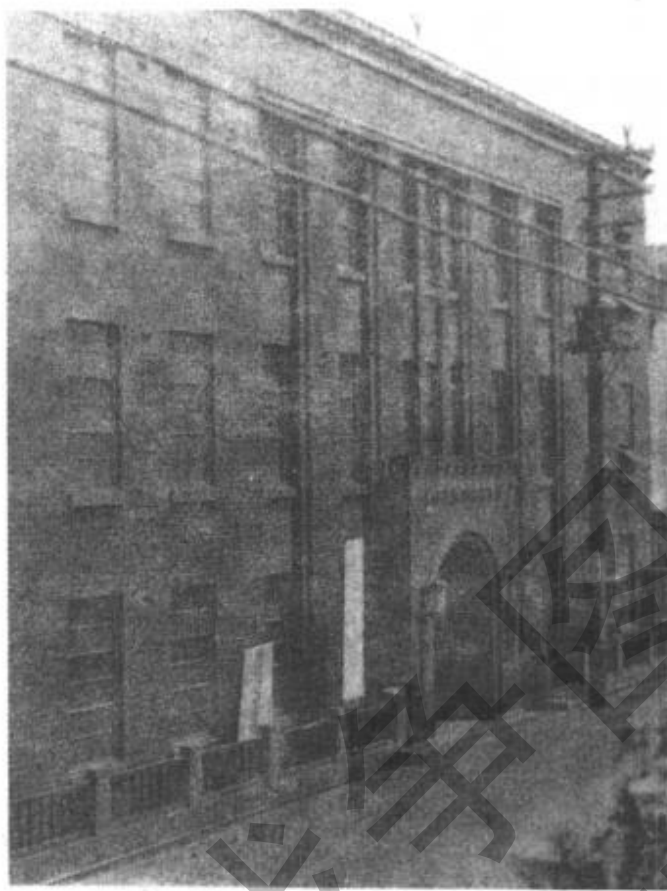
1939年我动脑筋去日本，反对的人多，我父亲也反对。戴策当时正把生产建设协会的钱拿去投机买棉纱，进一件出一件的，叫我经管，每月给我30元。1940年伪组织成立，他们到南京当汉奸去了，叫我把钱结束分掉，而每个月还支30元给我。我还是想去日本，觉得生活用钱足够了。到七八月我下决心走，因为在上海念书也是徒有其名而已，还听说在日本只懂英文也行。到8月我对家里讲时，家里也不再反对了。我到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去，在江西路汉弥而顿大厦，我问卖票的人，不会日

文会英文去日本行不行？他说完全可以。我又问手续，他说不需要。票价好像是统舱8元。正在买票时，来了一个在日本法政大学读书的常熟人，叫徐忠信，他说他正好回去，叫我一起走，我们就一起买票。我什么良民证、户口证、学生证也没有，也不需要，只填了张购票表，交了8块钱买票。那时上海长崎之间有两艘船，一个上海丸，一个长崎丸，一周一趟。

走那天，我第一次过桥了。我收拾一个简单行李，里面放了一套《曾国藩家书》，到杨树浦码头上船。一间舱里有4个人，全是去日本留学的。一开船有便衣来检查行李，问情况。海上风浪不大，我还是吐了。到长崎登陆用了两个小时，最后盖个章，我就登岸了。我们在船上就买好去东京的火车票，一起上车到东京。徐忠信带我到他的住地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带我去找住地，在高田马场站前面，找到一家公寓式的房子，有4叠半大小，做饭用投币的煤气，烧不完还可以存起来下次用。我当时一句日语也不会，自己生活，到外面吃饭，给店员一毛钱，他会找你一分钱，然后给你一碗饭、一个菜、一碗酱汤，这叫定食。一大碗饭足够吃的，用不着说日语，后来才学日语的。

第三天，徐又领我到东亚学校报名，交学费，买优待学生的车票。学校一年分两个学期，一学期15元钱，也可以按月付钱。然后他又领我到日华学会，那里有书报可以看。到中午他又领我到旁边的扬子江饭店吃中国定食，毛五分钱，菜有炒猪肝或猪蹄。生意好极了，现在那饭店已经是一栋大楼了。学校里同学中华北人多，华中人少，记得有两个禅宗和尚同学，一个叫不二，跟日语富士山念法一样，就记住了。他们是从扬州去的，后来我在京都宇治万福寺还碰到过他们。

东亚老师记得有铃木、高仲、椎木几位。学习用的教科书我后来还带回国了。他们教课很严格，一个学期教三本书，今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正门

天讲，明天就要学生背出来。比如讲北海道开发长官克拉克，那是个美国人，明治初年日本政府请来的，他的讲话里面，说，孩子们，你们要有雄心壮志等，全得背出来。不过你不想学习，学校也不管，只是一个月考一次，成绩要送给你将去的学校。当时东亚学校与外务省没有直接关系，战争后期才有关系。这个学校创办人是松本龟次郎先生，据了解，战前中国赴日留学生有4万人，

其中2万多到3万人，都是从东亚学校学习过再进大学。老师一天到晚总是在学校，你有问题随时可去问。教室在下午也是留给学生用，不要钱，只是喝水要自己去倒。

钟：那么您怎样与松本龟次郎先生相识的？

汪：我在校内努力学习日文，在学校附近的书铺里，松本先生的书特别多，我也买了不少。他的书特别适用。听人说，松本先生曾在京师法政学堂当过教习，我就想，他会不会认识我的曾祖父？11月左右，我搬到西神田住，我看松本先生书上的翻译用中文词，已经显得旧了，我想建议他修改一下，用些新的中文词。我就写了封信，交给学校老师，他告诉我，松本先

生住在杉並区阿佐谷 5—76，叫我直接寄去。我在信上就用中文写了问题，并问他是否认识我的曾祖父？按中国习惯，我也不指望他会回信，也许能在校内见上一面就够了。

那时我住在西神田一个食堂的楼上，学习日语方便，老板白天没事，经常同我聊天。这个楼两面靠马路，我住在楼上一角，从窗口看出去是一个大转盘，比较热闹。那一天，我正在楼上念书，老板儿媳上来叫我，说：“汪先生，下面有一位老先生来找你。”我说：“我没有认识的人。”她说：“不会错的，他手里还拿着你的一封信。”我明白了，那是松本先生，离我发信才三天。我就下去，那时已经 5 点钟左右，食堂还没有多少客人。他个子比较高，魁梧得很，手里拿根手杖，我们就在食堂里坐着说话，他的头发早就全白了。他用日语同我说话，说得很慢很慢，我开始用中国话回答，他就说：“汪君，你会多少就说多少，不要拿中文讲。”他这是用中文说的。他又说：“我懂中国话，可是你是来学日语的，应该用日文讲。”我就用日语慢慢说，说错了，他马上纠正，一句句改，告诉我应该怎样说。

按中国人的规矩，他来看我，应该由我请他吃饭，可是楼下这个食堂，我不好意思请他吃，因为那是供附近小装订厂工人用的。他看出我的意思，就说：“汪君，你今天跟我走，我请你吃饭。”我说：“实在不敢当。”他说：“没什么不敢当的。我在北京时，受你曾祖父照料；现在你来到东京，应该我来照料你，你也别客气。”他那时挺健康，就领我穿过电车路，到岩波书店后面的铃兰通，进一家叫“维新号”的挺大的中国饭店，他告诉我说：“这家饭店同中国留学生关系很深，是宁波人姓郑的开的，大约在 1923 年，留学生曾经在这里同日本警察打架。”他那天还请饭店郑老板出来见面。后来，1986 年，松本老师的孙子又在维新号请我吃饭，把老板又请出来，讲我们当年吃饭情

况。这位老板已经入了日本籍，现在哪里的价格很贵了，吃烤鸭3万日元一个人，阔极了，订房间都要提前一周。那次我们吃饭仅点了两个菜一个汤，这样子，我就认识松本先生了。

一路上，他还领我在铃兰通绕了一圈，一直绕过东亚学校，经过丸善书店、三省堂等。分手时，他说他从这儿坐车到饭田桥去，问我认识回去的路吗？我说我认识。他在一路上，都用日语很慢地同我谈话：这句应该怎样讲，那句应该怎样讲，日语中有许多是没有主语的，你要注意，书上是按照规矩写的，有主词、动词什么的，说话就不是这样。他还说：“我去东亚学校，上课时不能找你出来，这是东亚的规矩。假如你不上课时，我会去找你。东亚的老师都是我找来的，椎木和有贺尤其是，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跟他们两人讲。”至于我信上问的语言问题，他说：“这次太匆忙，下次有时间，我请你到我家里，再给你讲。现在也来不及改了，现在这一版已经在印刷了，下一版再改吧。”他的书一年要印3—4版，一次要印3000本，他退休后的生活全靠这些书。他是很注意适应新观念的，而我们中国却是10年一贯制，一版到底呀。松本先生的书，现在台湾还在用，写“松本著”。他告诉我，上次是钱稻孙在1924年帮他改的，到30年代就不合用了。

中国很多名人当过他的学生，鲁迅、钱稻孙全当过他的学生。“周恩来学过没有？”我也问过松本先生，他说记不起来。而同周恩来一起的同学张某，他还记得。胡华教授当年写《中国革命史》时，问过周恩来，周说他到日本的第一个老师，就是松本龟次郎。这个情况，是从胡华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第二期的文章里知道的。松本先生承认我是他最后一个学生，到现在我同他家还有往来。他的家乡静冈县，今年秋有纪念他的活动，还邀请我去。静冈成立松本纪念馆，整理他留下的书信，



汪向荣（左一）与松本龟次郎先生一家

发现我写给他的信及他给我的书写的序言，全都留下来了。他给我的信，在“文革”中全搞没了。

钟：您在东亚学校一共读书多少时间？

汪：8个月。我在东亚解决了日语的问题，会讲会写。东亚的老师的确实素质高，他们几乎全是东京大学毕业，教书认真。学校作文本子都特别，直写间距大，老师在上面批得很仔细。

日本政府有很大的失策，它早就应该将东亚学校收归国有，由国家办就好了。日本太不重视中国留学生问题，现在的日语学校多是骗钱的。你要是办一点像东亚那样认真的学校，效果就会不同。主要还是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有问题。

钟：您同松本先生后来交往如何？

汪：第一次见面时，松本先生给我画了去他家的路线图，叫

我坐车到中野站，再换银色的公共汽车，到伊势森林下来，往后走一走，就可以到他家了。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就试着去找他。上了公共汽车上我买票，女售票员一见我说话很不利落，就问我：“你是不是去看松本先生？”我说：“哦，你怎么知道？你看我是中国人？”她说：“对，我看你是中国人。中国人来一定是找松本先生的。这条路上找松本先生的人很多。”她又告诉我，下车以后，往后走，一分钟左右，右手有个门，写着“松本龟次郎”，就是那里。我看这个地方很安静，当时属于东京市，等于郊区，人很少。那一次，松本先生给我详细讲了书中那些名词，说有些名词中国话可以这样用，日本话不能等等。他又领我到他家后面看，是一片大森林。他的小书房才3叠左右，正面对森林。他又告诉我：“你如果来时，从前门叫不应，就绕到森林里面，直接进后门，我家肯定有人，就是叫门听不见。”这是我去看他的第一次。

后来他又到学校来找过我，慢慢就熟了。我是想了解日本人，我在西神田住了两个月，就搬到高园寺车站附近一个公寓，很安静，从那儿去松本先生家，坐车就一站路，走也只要20分钟，这样就更方便了。松本先生散步，有时也来看我。开始我讲话还有顾虑，他却是挺随和的，我在他家吃饭，上街也是他请客吃饭。我在住地认识一位台湾太太，她能在黑市买到鲤鱼，我有时就托她买一条鲤鱼弄好，送到松本先生家请他们吃，他们很高兴。当时松本洋一郎刚进初中，他弟弟上小学。松本先生也喝日本清酒，我也买过带给他。熟了以后，慢慢就谈起中日战争的事情，他说：“这次战争是没有打胜理由的，你不要看日本现在到处占领，打胜仗，可用不了两三年，就得这也打败，那也打败。你看着吧。”他这话是到处讲，他的孙子洋一郎后来告诉我，他在电车里也讲，不在乎得很。本庄繁，那个侵略中

国东北的原凶，就曾是他的朋友。本庄繁上任时，他写封信给本庄繁，反对侵略中国，说：“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本庄繁回了他一封长信反驳他，现在这封信还存在纪念馆里。他的反战是有根由的，他是在明治年间学的汉学，他常说：“中国对日本有这么大的恩惠，今天日本人对中国应该以德报德，不应该侵略中国。”有一次我向他介绍了日本兵在沦陷区的烧杀行为，及我所看见的南京大屠杀照片情况，他说他在日本报纸上见过日本军官在南京杀100多人的照片，说：“那简直就是禽兽。”他是非常反对战争的，但他作为老知识分子，无可奈何。

我在1941年2月考京都大学，没有考上，回到东京。我去托他再写一封信给京大的老师，帮个忙推荐，我们又谈起来。他就说在汤岛圣堂，就是孔子庙，在明治大学附近，有一个斯文会，讲汉学的，经常有集会，问我愿否去参加？我答应了。在2月很冷的一天，他领我去。会在一个小礼堂里，9点开始，来的多是老先生，年轻的只有二三人，都是东京大学学生。来的人中我只记得有盐谷温先生，那天讲“战”字，讲的人引用许多中国古书，还写在黑板上，讲了有半个钟头左右。他们显然全是反战的，特务也不来打搅。讲完后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老实不客气地说：“我还不太懂，不过我在小时候念过四书五经，记得上面有一句话：‘止戈为武’。是大家不用动兵器的意思。”他们就这样一个个地讲下去，例如讲：“将骄卒堕”，讲演人说现在日本兵在外面耀武扬威，已经到离败的时候不会太远了，这个战争不可能是胜战。又问我的意见，我说：“不知道，也不敢说。”

到后来，有些东亚同学对我说：“你别老去松本先生家，他的门口有刑事罗唆。”我就同松本先生讲了同学的话，松本先生说：“是有这样的事，你碰上了别理他，由我来讲。”那时日本

警察说厉害也厉害，我刚到东京住下去登记，警察已经从我在船上填的表中知道我的情况了。后来我经常去找松本先生，警察也曾到我的住地，问我干什么老往松本先生家跑？有什么事情？我说：“我请教书上学习的问题。”他说：“你干什么去得那么勤？”我说：“我住得近，当然就勤了。”警察就告诉我说：“松本先生已经退休了，不再负担什么教育责任，你没有什么事情就不要老去找他。”我后来同松本先生讲了这次谈话，他说：“他们无聊，你不要理他。”所以我同松本先生始终交往。1942年我要回国，去他家告别，用我那台很次的照相机，同他家合影了一张照片留念，就是后来在《中国画报》上发表的那张。战后，他的孙子从一桥大学毕业，就职了，给我发了一封信，我当时在东北，辗转才收到信，我通过当时的军调部给他回信，才恢复联系，至今我们还有很好的关系。1984年他的家乡成立松本纪念馆，成立松本公园，邀请我去。当时我的单位领导还是左倾思想的副所长×××，他说：“不能走。”结果1984年就没有去成功。1986年退休后我才去，静冈大东町方面举行很大欢迎活动。像这么一位老教育家，日本人没有忘记他，当然中国人也没有忘记他。我大约在1980年左右就写了文章，在《中国画报》上发表了。中国人对给我们做过一点好事的人绝对不会忘记，后来的人也应该不会忘记这位老教育家。他的的确确在日本军国主义最疯狂的时候，在所谓“膺惩暴支”的时候，就起来说话，还印出书来发表，反对侵略中国。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军部也没有敢对他怎么样。不过后来还是受特务监视，被疏散到家乡去了。

松本先生还介绍实藤惠秀先生给我，这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深。我在东亚学校念书时，看见一本实藤惠秀先生写的书：《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也发表在《日华学报》上，非卖品，我

只能在学校看。后来我就同松本先生讲起见到这本书，松本先生说：“这好办，这本书我有，可以送给你，不但送你，还可以把写书的实藤介绍给你。”当时实藤先生在早稻田第二高等学校当教员，家在大冈山，东京工业大学附近。松本先生马上就为我写了封信给实藤先生。没隔几天，松本先生到我家，把实藤先生的回信给我看，说他欢迎我去。我说很想见他，请他约个时间，松本先生又代我写了封信，并且知道我不认识路，还问他怎么走法？叫他画个路线图来，并且让在明显地点等我。

就这样在秋天的一天，我照实藤先生画的路线图，到洗足池的旁边，实藤先生就在一个电车站下面等着我，我一看就知道是他。我们约定他手里拿一份报纸，我手里也拿一份。他看见我就用中国话问我：“你是不是汪君？”我说：“是。你是实藤先生。”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他就领我上他家去，那时他的家不大，是平房。他问我：“能说日本话吗？”我说：“能说几句，但说不好。如果不清楚时，请你用中国话说。”他说：“我的中国话也说不好，实在说不清楚时，我们就写吧。”我在他家谈了半个小时左右，来了一位女宾。他就介绍，那是下田歌子女士作的作者。她拿出一些女学校的相片，让实藤先生认那上面是什么人？实藤先生让我也看，那上面的女学生全是19世纪末时的装束。我就问上面有没有秋瑾？实藤先生说：“没有。她还要在后来。”那上面大概是章宗祥和曹汝霖的夫人。

后来实藤先生同我也交往多了，他同我说：“我写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是从日本人立场写的，你看有什么缺点？”我说：“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你没有把社会背景写进去。”他说：“那你就从中国人的立场，是不是也写一本？”有一次我们两人一起去看松本先生，谈起他的建议，松本先生说：“对，这个意见非常好。汪君，你可以写一本。要什么资料，我可以供应你，

这里资料也不少，帝国图书馆也可以随便看。”实藤先生则特别同我说：“你上帝国图书馆太远，路上要花一个小时。不如就在神保町，去旧书店里看书，有的是书。”那时，我已经不住西神田了，但已经习惯跑神保町看书。我就开始准备写书。

实藤先生是不修边幅，邋邋塌塌的样子，脚上经常穿一双木屐。我记得他第一次接我时，穿一套和服，睡衣不像睡衣。后来穿西装也是马马虎虎。他家里到处是书，堆得乱七八糟。来了客人，丢一个座垫给你，他也拉一个来坐下，就在书堆中聊天。实藤先生有个习惯，一边说话一边喝酒。我第一次去，他就不客气地说：“喝酒吧，一起喝。”是大瓶三升的清酒。熟了我就问他：“酒不容易弄到，你怎么这么多？”他说是早稻田学生送给他的。他很喜欢一边写文章一边喝酒。烟我是没有见他抽过，不过听别人说，他也抽烟。他家中有一间屋子专门放书和资料，没多久他就搬家到中野区，那儿房子院子都比较大了，我去他那儿也就两站路。我们经常互访，也一同去看望松本先生，也一同去访问一些老留日学生。记得有一次我们曾去访问殷汝耕那个汉奸，殷就住在高园寺附近，他是在通州兵变后逃到日本的，他太太是日本人。他谈了许多清末、民初留学生的史料，后来实藤先生在文章中都使用了。访问谈话时殷常用日语，说中文时口音很重，重要的人名地名，他就写在纸上，实藤先生都保留着。中文的记录我本来保留着，文化大革命时就没有了，一把火在院子里烧掉了。

因为实藤先生有稿费，时间也比较多，所以我们也就经常去图书馆、去旧书店搜书。当时百货公司也不定期卖旧的和刻本、手稿等，价钱也便宜，我们陆续买了不少，现在有些保存在实藤文库中。像和刻本的中文图书，我们买过不少。有一次，我买到一部《普法战记》给他，他说：“这书不容易见到，你先

拿着。”后来我又碰到一部，才买了给他。那时我们还买到不少清末江浙商人与日本人笔谈的记录稿。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我去日本之前，就发现清朝驻日本公使级重要人物黄遵宪与河内辉声等人的谈话记录，一大堆，后来叫做“大河内文书”^①，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实藤先生从大河内家庙里一次借5本、一次借5本那样借出来，让我也看。那些谈话是写在一张张纸上，后来把50—60张纸订成一本记录稿，大小一样。内容是彼此的笔谈，笔谈用的是黑字，另外在旁边用朱笔注明谈话时候的情况及人物动作姿势，读起来很有意思。我开始看的时候，这些稿本，每一本的前一页、后一页，中间每隔几页，都还夹有一张烟叶子。到后来战争困难时，香烟配给，一个月才几包烟，烟叶子就给抽出来吃掉了。这批大河内文书现在大部分保存在大东文化学院，实藤先生当时借有几本，在早稻田大学保存。我没有见过全部大河内文书，早期的我见过，后来由佐藤三郎抄写过，这是一批中日文化交流很有价值的文献。我曾经有郑子瑜写的和实藤写的两本书，实藤写的那本叫《大河内文书》，都给郑海麟拿走了，没有还我。

钟：我没有见过。

汪：哦。后来我们在旧书店也发现黄遵宪的文稿。那天，实藤先生是在下午二三点钟发现的，他马上跑到我家，拉我一起去看，我们都肯定是。那是一堆，乱七八糟，价钱很便宜，不到一元钱就买到了。实藤先生书呆子气非常浓厚，他有什么资料就给我看，我找到什么也给他拿去。实藤先生不是叫我不

^① 大河内文书，是十分珍贵的中日文化交流的笔谈记录原稿。日本藩主源辉声，在1875年至1881年间，与中国文化人笔谈数百次，合订成《大河内文书清韩笔记》，共订成96卷。原稿现藏于早稻田大学和大东文化大学。实藤惠秀博士曾经整理翻译出版一小部分，为《大河内文书——明治日中文化人的交流》。

费时间去图书馆吗？叫我去逛旧书店。我常去的是三个书店，就是一诚堂，可以在里面从早看到晚，过道有几张小凳子，你可以拉出来坐着。店员很有礼貌，见你看得太久了，还倒一杯日本茶给你喝。你想在店里抄书，随便你抄。山本书店里面，总坐着一个穿东京大学学生服的年轻人，恐怕是亲戚来帮忙的吧？他整天也是在看书，我有时还请教他，他也问我中国古文，可惜他的姓名忘记了。我经常坐在书架前面看书，有人来就要站起来让路。有时碰上好书要买，一看钱没带够，他会给你保留，过一阵子再去拿钱买回来。

文求堂里的中文古书比较多，价钱也贵，老板是军队翻译出身，他懂一点中国文化，曾经想把女儿嫁给郭沫若。在这些书店里偷书的人也是有的，一般管书店的人也照顾不过来。不过偷书的人很少很少。当时在中国上海的书店也是开架营业，但看得时间太长，店员就会过来探视。日本可不这样，日本人首先是不把你看作小偷。在内山书店还可以订书，订中国国内的书，当时国内法币虽已贬值，但与日元比价不变，订书也是照原价，不用另外加钱。我在上海时每月生活费30元就够了，到东京时我也准备30元一个月。开始不买书更用得少，东西也便宜，一件衬衫才九毛九分钱，吃顿饭一毛钱。到1941年下半年就开始涨价，要“点”来买东西了，吃米饭要“外食券”，一顿饭一张。只有我们在扬子江饭店吃时米饭会多一点，我也请实藤先生一同去吃过，他不在乎。我们也常去吃一毛五分钱的印度咖喱饭，那里的餐具非常漂亮。

我后来在高园寺写出了中文的《中国人留日学生史稿》，后来印出来几章，即《日本教习》等书。我在那儿写书很安静，便衣也很少来捣乱。但如果在路上碰到，熟悉的便衣会拉我喝茶去，我们都自掏腰包，一毛钱一杯咖啡，后来只有咖啡代用品，

我们就改喝牛奶。有一次，实藤先生同我在路上走，碰到那位便衣，他不认识实藤先生，就问他是谁？实藤先生掏出名片，他一看实藤先生是早稻田大学教授，就又鞠躬又行礼，连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请我们去喝茶，他自己掏钱之后就先溜走了。实藤先生对我说：“你不要怕警察，他们就会欺负中国留学生。这一个还可以，在北京的日本警察更可恶。”

有一次，在北京的安藤更生先生回东京去，他在北京的新民印书馆当总编辑吧？他去看实藤先生，实藤先生就拉他到我在高园寺住地来看我。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他拿一张穿着长袍在扬州照的相片给我看，戴着个黑边眼镜，我说他完全像个中国人。他是实藤先生的好朋友。另外还有一位教育学部的安井先生，1956年他还到北京来看过我。还有斋藤秋男、竹内好先生也认识了，还有增田涉先生，他们多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这批人很有意思，当时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含有贬意，这批研究中国的学者偏偏称之为“中国”，他们还写文章发表，在报上批评称“支那”的人。他们中有的人也来中国打过仗，但他们都是反战的，只是说法不如松本先生明显。他们有时去小咖啡馆吃一顿，各人自己掏钱。他们说话太快，我听不太懂，只有曹钦源是台湾人，同我说中国话。

钟：您后来去京都，有什么回忆？

汪：第二年，1941年2月份，要考试了。中国留学生里面差别很大，我当时想学习历史学或教育学，我同松本先生、实藤先生都商量过，松本先生说：“历史学最好是京都帝大，你想办法去考试。”他又告诉我，以前的留学生考试同日本学生一样，1940年以后就不一样了，只有正规学校像一高、三高一直读下来的还是一样考。留学生考试则比较容易，只要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日文文章；再就是日语；最重要的是“面接”（口试）。松



京都车站（1928年11月7日）

本先生还说：“京都帝大的历史学是最有名的，矢野仁一教授也在其中。在京师法政学堂时候，他也同你的曾祖父有交往。你去时，我可以写一封信给你带去，你可以去找他一下。不过，我要同你说明一下，矢野教授在东洋史研究方面，是全国第一的，但他的观念跟我们不一样，他完全是御用思想。”

我就坐火车去京都，在车上睡了一夜就到了，我先到京都帝大大钟楼里办报名手续，然后我就打听矢野教授地址，办事的人告诉我，他住在松崎，还给我画了个路线图。我乘车到了松崎，找到一个警察所去问，一个警察就带我走到矢野教授家。我呈上信，矢野教授一看信就说：“哦，你是汪提调的曾孙。他好吗？”我说：“他在1910年就过世了。”他说：“哦。他在学校时候很厉害呀！不单中国先生上课他要听，我们日本先生上课他也要听。他的汉学基底非常深，他同吴汝纶当年都是在李鸿

章幕府里，是不是？”我说：“对。矢野先生，您的记忆力非常好。”他说：“是呀，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曾祖父，你要努力。你这次来有什么目的？”我说：“我想考史学部。东洋史是先生的专长，希望能够帮忙。”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日本的东洋史主要讲中国史，用的书也基本是中国的书，当然也讲点别的。中国史应该在中国念，怎么跑到这儿来念？”我说：“我是想听听，日本人对中国史怎么讲法。”他说：“哦，好的。不过我只是名誉教授，起不了作用，一切都在教授会。不过在小的地方可以帮点忙，你现在报名没有？”我说：“已经报完了。”他说：“那你就准备考试吧。”我说：“考试前我是否再来看先生一次？”他说：“也不一定吧，不过你要来就来吧。”过了两三天，我又去请教他，考试要注意什么？他说：“也没有什么。不过，我给你去问一下吧。”他就叫他的女儿，叫她陪我去学生课问一下情况。他的女儿就陪我去京大，把我托付给学生课负责考试的木村素卫先生，他是哲学系的老师。后来富永光司在北京告诉我说：“嗨，矢野先生的女儿在京大很有名气，她很漂亮，京大高年级学生都追她。因为京大那时没有女学生。你可真幸运，由她来送你去。”

考试那天，我写了一篇作文，是说我为什么要考东洋史。接着考日语，其中有一问是：用日本常用语音来注明“团扇”，我以为就是ダンセイ，我写上了。后来，通知我考试不及格。我就问木村先生，他告诉我说：“应该用俗语ウチワ。你们留学生绝大多数没有答对，没有得分。”第二天“面接”口试，那一关可是相当不容易过。口试老师有三个人，我全不认识，木村先生站在旁边。问的话非常深，第一，“你为什么要到日本来留学？你知不知道中日之间在战争中？”第二，“为什么要考我们学校？”这两个问题我有准备，可以对付。第三个问题是：“你对将来有

什么抱负？你从我们学校出来之后想干什么？”当时我的回答是：“我想第一，中国和日本，不能永远打仗。战争停止之后，中国一定要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要效法于日本的建设方面很多。当年中国为什么变法会失败？日本维新为什么会成功？我想了解。第二，我的性格和家族关系，我不适合于搞法律经济，适合搞比较内向的研究工作，搞教育工作也好。所以我报考历史学，想研究中日关系史，如这不行，我是想搞职业教育问题。”我这个回答恐怕是合上了主考老师的心意，后来木村先生告诉我，那个主考老师非常赞赏我的回答，说一般的中国留学生夸夸其谈，说什么回国要当政治家什么的，要怎么跟日本友好。你没有这样讲，而是讲自己的想法。

那次我是住在一个小旅馆里，10天左右，木村先生来看我，告诉我考试不及格。然后他又说：“你还是有希望的，要是有矢野教授那样有力的推荐，你可以做试读生，一个学期后考试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转成正式生了。”

我又去找矢野教授，他开始是不肯，反问我看过他的书没有？我告诉他看过的书名。他又问我对他的书的看法。我就说：“我对矢野先生的学识，非常佩服，特别是对中国史造诣这么深。可是我作为中国人，对矢野先生的见解，也有不赞同的地方。”他说：“是什么地方？请你说说看。”我就说：“矢野先生说，‘中国’不过是一个地名，不是一个国家。根本没有‘中国’这么一个国家。矢野先生这样说是不是过分了一点？当然，中国在过去没有用中华帝国的名义出来，到清朝后期才用。清政府的确不是一个以汉族为首的政府，可明朝、宋朝则是汉族统治。矢野先生是不是知道，中国是包括汉、满、蒙、回、藏这五大民族组成的？无论那一个民族当政，都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矢野先生说：“那是明朝以后的事情，以前不是，满、蒙根本不

是中国的。”我说：“不对。正跟日本一样，日本历史上有南北朝，有幕府，你能称镰仓幕府统治的地方不是日本吗？所以矢野先生这个话，在日本人看来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在中国人看，或稍为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看来，则是不对的。”他说：“汪君，你的想法还是很有一点见解的。”我说：“不是，我只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对矢野先生提出一点意见。”他听了这话以后，留我在他家吃饭。饭后，他对我说：“汪君，我给你写这份推荐信。”另外又问我，以后来上学，打算住在哪儿？我说我想住在离学校近一点的地方。他说：“那很好，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在大路町，吉田神社附近，在一条相当安静的小巷里。主人是医生，夫妻二人，儿子当兵去中国打仗，可能已经死了。他的房子很大，你可以去住，并且不一定要房租。”我说：“不要房租可不合适。”他说：“那你先去看看吧。”他写了推荐信，又叫他女儿带我去。信交给他女儿，由她交给京大，我就不用到学校去了。矢野小姐带我到吉村医生家，在中大路町。吉村医生也有50岁左右，欢迎我去住。矢野小姐给他说起我要交房租，他说：“你怎么这样子。那你就付一块钱吧。”我说：“一块钱不好意思。”他说：“那你就多付一点，你付多少？”我说：“三块钱。”他说：“可以，可以，完全可以。我再送你一份报纸。”那时报纸要一块多钱一份。我又告诉他要一个多月后再来住。他说：“随便你怎么时候来。”不久，学校就通知我可以做试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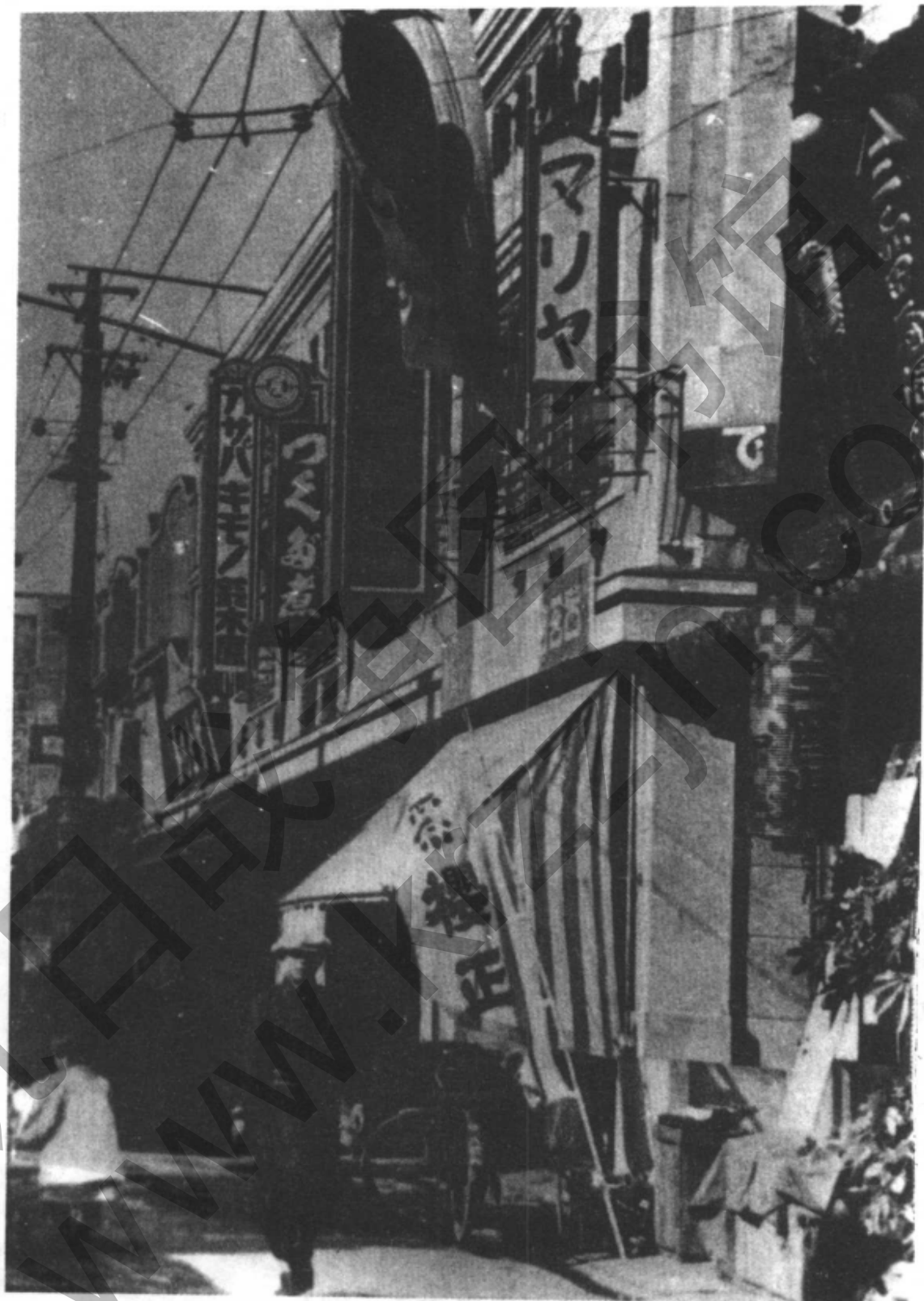
我又回到东京去了，还住高园寺。周围住的早稻田大学生也认识一点了，他们经常泡吃茶店。没有钱了，他们会去质店（当铺），把学生证往上一放，就会有一块钱出来。警察也来找过我，一进门，店主人不客气，说：“汪先生在用功，你不要去打搅他”，赶他走。到四月初，我第一次去上野公园看樱花，是松本先生领我去的，赏花人男男女女，男的多是老人。午饭在

翠华轩吃的，是西餐。那时我从上海带去的日用品，比日本货还是好。我还送过西湖牌毛巾给松本先生。当时日本年轻女的比男的多，我住在西神田楼上时，一些年轻女工要上来玩，店主常常不让她们上楼。她们就在下面等着我下去，领我一起去看电影。电影院里放电影是24小时不停的，你随便看多久都可以，大家随和相处。但是日本的教育厉害，小孩子们一见到我，总是喊：“支那人”、“支那人”，很令人讨厌。

在西神田，我有个邻居，在食堂隔壁开了个小药铺。那时的小药铺等于中国的小杂货店，代卖邮票、文具、小食品等等。他们夫妻两人，还有个小孩。店主缺一条腿，用两根拐杖帮助行走。我的房东告诉我，他的那一条腿，是在中国战场上被打断的。房东说：“他亏得打断一条腿，要不他还回不来呢。”我开始听说是在中国打过仗，不愿理他，只是急需邮票什么的，才到他那儿去买。因天天见面，我们也就渐渐有些交谈。他说他的腿是在徐州战场上被打断的，我想那应该是台儿庄。他又告诉我，他是同我房东的儿子在一个连队，房东之子已经被打死了。我开始先想他是不会对中国人有什么好感的，但是我慢慢地觉得并不如此。我有时出门，小孩子总跟在我后面骂我，他只要看见，就撑着拐杖从铺子里出来，轰走那些小孩。几次之后，熟了，我就问他：“你大概在中国杀人放火，什么都干吧？”他回答说：“杀人没办法，打仗嘛，总是要杀人的。不过，我总是跟当兵的对杀。”我说：“不见得吧？许多中国老百姓死在日本兵手里。”他说：“杀过。不过，所到一些地方，老百姓早就跑光了，偶尔有几个。你们中国老百姓，厉害得很呀，拿着刀就过来跟你拼命，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他脱开上衣，让我看，他手臂上有一条刀痕，他说就是中国老百姓拿刀砍的。我说：“你大概也干过强奸什么的坏事吧？”他说：“也不能说不干。一

当了兵，就没有了人性，跟野兽一样。特别是班长、曹长、上士那些家伙，简直不是人，到处找花姑娘。我总还是老百姓出身。”我说：“那你也烧过老百姓的房子吧？”他说：“绝对没有烧过，我自己也是种田人家。放火烧的全是班长那些家伙。”他又说：“我有次生病，中国人对我也很好，跟我们日本百姓一样。反正现在我也缺一条腿了，我也绝不再去打仗。我看小孩子在背后骂你，我就觉得很讨厌，很惭愧。”他开这个小铺子，也赚不了什么钱。每次有什么配给，他就会告诉我去买。还有，附近装订厂女工很多，中午常来食堂讨杯水喝。他就对我说：“日本现在花姑娘很多，你要是看中那一个，你跟我讲。”我没有理他。他又告诉我说：“原来住在你那房子的中国留学生，就搞过好几个。”他还说他那儿有避孕套避孕药，一毛钱一份。不管怎样，周围的老百姓对我都没有敌意，什么都说。我住地附近有一间小学校，我本想去看看，他也劝我不要去看，说那些老师混帐得很。我为了学发音，还订了一份报纸：《儿童每日》。我看很多日本人不订报也不关心社会。

我想当时东京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就用这段时间走走。我买的月票，不能坐市电。市电上去就6分钱，买本票是一块钱20张。不管你到那里，一张票一次，你想中途下车也可以，只要跟售票的人说明你要到哪儿，他就会给你一张条子，上面有路线图。他在上面卡一个洞，从哪到哪，再在时间上卡一个洞。我们许多同学都懂这个窍门，买一张票就可以转来转去，6分钱可以转游东京一天。街上、电影院里都贴有很多标语，什么：“满蒙是我们的生命线”、“敌人就在你身边”等等。银座的商品价格都有政府控制，商品很少有外国货。浅草寺我也去逛过了，门上挂两只大草鞋，附近有很多妓女，寺前商业街上我也买过许多小商品。东京帝大赤门也去看了。当时绝大部分中国留学



东京中野商店街（1934年）

生可以申请到庚款，最多可以到80元，最少也有30元，所以留学生生活都相当优越，没有打工的。我曾买过一套雕花玻璃杯，寄回上海，寄费很便宜，也不用管包装，他全弄好，塞上木刨花，就寄到上海了，一点也没有坏，也没有海关检查。我也配过眼镜，照过相片，是24张连续的黑白相片，不到一块钱。我叫他寄到上海，不另外加钱，他也寄了。晚上新宿一带有许多小摊子，有书卖，我也去逛逛。小吃有一种烧鸟，是一串烤肉，一毛钱一串，外加一小杯日本酒。

日本皇宫前面有电车经过，一到二重桥，车上就有人叫：“起立，敬礼。”很讨厌。车上有些穿戴大学生服装的学生照样坐着不理。我问过早稻田大学生，他们说很讨厌。而车上如有中学生的话，就会叫你站起来，骂你是“非国民”。所以我们一般都绕过这地方。日本当时的右翼政党很活跃，笹川良一就是一个，他有时在神保町、日比谷一带为他的右翼政党宣传，叫做“大日本爱国党”吧？用一个平板三轮车，四面一围，上面放个桌子，笹川良一就站在上面，拿个纸喇叭，到处乱喊，什么“支那人非征服不可！”我都听过，满街乱骂。现在他搞船舶振兴会，发了战争财。至于报纸上乱吹的文章，没有什么人理会。农村我也去过一次。食堂老板是茨城人，有一次，他的亲戚要回家，问我去不去看看？早去晚归。我说去。我们到茨城，下火车走20分钟左右，沿路房子多是草顶的，屋里东西很少，很穷困，跟中国农村差不多。

我后来在京都，很少到处走动。我有一个同学胡家法，住在北白川川道上，他学习数学，用函数算命，因为看不懂《易经》，就老问我。我们住得也比较近，来往多点。

钟：您怎样在京都开始历史课学习的？

汪：京都大学史学科当时有学生20人左右。哲学科也是20

人左右，大家混合着上课，中国人就我一个。同学里有一位秋元子爵，他的家在山科，听说他后来从东南亚坐船回国，沉船而死。老师中不少是有名的，指导我的主要是塚本善隆，他后来是人文研究所所长。我一去就选他的课，另外还选学西田哲学课。当时史学科里还有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等教授。塚本先生是讲佛学史，他对我影响很大，他不相信书上写的，一定要证据。到现在，孤证我还是不相信的。在后来我查找鉴真和尚的资料，证明他在日本的后期是不得意的，前期则是皇室当做宝贝似的尊重。60年代国内有人要我写出来，我就写了，这同当时的说法不合，要我改写，我不肯改写，结果1961年我写的稿子，到1978年我平反以后才得以出版，到现在我的观点还是不改，鉴真和尚到招提寺去时，因为不合统治者要求就已经离开政治中心了。

京都的学习对我影响非常之大，前几年，北京社科院李凌院长请日本井上清^①教授去讲学，李来找我（李也当过右派），对我说：“恐怕我们这儿几位先生对付不了他，请你来参加。”那一天，井上清教授在演讲中讲到“倭寇问题”，说倭寇主要是日本无主的浪人。我起来说不是这样。他知道我曾在京大学习过，就说我们观点不一样吧。我说：后期“倭寇主要是中国沿海小商人老百姓，”他说：“是，他们是跟日本浪人勾结的。”我说：“对，不过这些浪人是跟日本室町幕府勾结的。为什么呢？幕府想独占经济利益，让倭寇抢了中国沿海以后，还把他们的交给明朝政府做礼物，这样幕府才能独占利益。”井上清不同意，他说：“我知道肯定同汪先生观点不同，他是在京大受的教育。”我说：“这同教育关系不大，我主要是从中国史书上看的。我的观点是，

^① 井上清，日本京都大学教授。

中国日本两方面统治者在利害一致之下，把倭寇禁止一段时间；等到有利害冲突，日本就放松，倭寇又回来了。”京大学派有一个特点，对学术问题一定要把问题考据清楚。1989年我在京都国际文化研究中心发言，关于邪马台国问题，讲到佐贺发现吉野里遗迹时，我认为那里的酋长并不是什么大的酋长，因为中国的史书一般用字准确，并没有说那里有过大战。当时上田正昭教授在场，他站起来说这不是《倭人传》上的，我用这个字不对。我说：“你说得对，谢谢你的指点。”如果在国内，就不会为一个字相争。现在国内学风没有这样认真，我不太满意。前几年，周雷办《社会科学战线》杂志，我的稿子三校以后，我还要改，他同意了。京都学派很像中国历史上的乾嘉学派。上课没有讲义，老师指定参考书有七八本。我常去东方文化研究所看书，塚本先生就在楼梯旁边的屋子里工作。我在那儿抄了不少东西，抄在本子上的留在上海了；抄的卡片有二三千张，是把日文书翻译成中文的。我都带回来了，后来写书全靠这些资料，带到北京几十年。文化大革命来了，说是变天账，一把火全烧了，心痛得很。幸亏本子留在上海，以后就用上了。

塚本先生在1956年率代表团来北京，我还被允许去新桥饭店见他。过去他上课时我们非作笔记不可，我听不懂就要借秋元的笔记来抄。我是下了狠心学习的，当时年纪轻，绝对不愿意丢脸。我在东方文化研究所图书馆看书，有时塚本先生走了，我还没有走。我自己带饭盒去吃。我注意邪马台国，是因为从中国资料上就看到了，所以想看看日本人自己怎么说？怎么想？这不是日本教授教的，当时也没有想作什么一种专题研究。不过这种问题我也需要知道，越看文章越有兴趣。

我在京大学习时候，教师人才济济，哲学家西田已经去世，羽田亨先生在。我听的课有史学概论、西洋史、日本史、伦理

学、外语（德、英、法、朝）等，二年级才上专业课。我选修课是汉籍解读，塚本先生教的课，一周四节课，多在上午上课。他讲一个题目后，指定参考书，下一次课就用三分之一时间问学生的想法和意见，并不要你同他一样。这同我们中国填鸭式上课不一样。上课随便，你有想法可以提出来。我记得为太史公争论过。我学习记资料，抄过关于邪马台国的、倭五王的、倭寇的、元朝打日本的记录等等，还有丰臣秀吉打朝鲜的军事资料、倭寇方面有关的资料，如汪直、种子岛铳的资料、日本馒头的来源等。我始终认为，我是抱了要救中国的念头才去日本学习的，并不是想学了做汉奸。我认为两国战争不会永远打下去，到建设时就用得上我了，这种信念使我刻苦用功地去求知，一分钟也不肯浪费。

我在京大时，知恩寺和金戒光明寺每年一度的大书市，我都去了，里面搭着许多布棚子，棚子里摆各种各样的书、笔记本、碑帖等，价钱很便宜。我还去了趟奈良，东大寺、招提寺都走了一遍，鹿群很多，可以喂它们吃面包片。正仓院那天没有开门，只到了门口一看。我还同胡家法同学，一起去了宇治的万福寺，当年明朝的流亡者很多曾在那里，同中国福建的佛家黄檗宗关系密切。我们坐火车去的，过了桥有一家普茶料理店，我们吃了顿素菜饭，一人8毛钱，很贵了。寺山前后我们都去看了，已经到11点钟。我们想听日本和尚用中文念经，找不到，问主事，说上午已经念过，下午要2—3点钟再念。我们只好等着，到时一听，听不懂中国话。回来去问塚本先生，他说他们用的是福建话。真没办法。山上有很多中国和尚舍利塔，树林也很密。我还问过秋元同学，我说想去看看他们旧藩侯的家院，他也同意，领我到他家住了一天，在山科，从三条坐电车去的。他家院子是大，但要比中国的还是太小。有一点印象

很深，山科风景山水结构同中国江南相近，小桥流水人家，老百姓说话客客气气。

我的房东吉村医生和他的太太，都是知识分子，晚上我们常聊天，听广播。他们也不相信大本营公报，但是他们也奇怪，中国军队怎么那样不经打？一退就是几十公里。他们对我则毫无歧视，相处很好。后来我回国还同他们有联系，他的太太曾来信，介绍她的一个亲戚，叫松岛庆三，在上海当日本海军报导部长，我还去看过他。当时他家门口没有钉上标记，他们参军的孩子下落不明，他太太每天烧香求保佑。医生性格同我相近，来看他的朋友也少，只有医院的护士来找急诊。有一次是圣护院庙会，他邀请我去，我没有去。第二天他们还送我一盒圣护院煎饼。

我每天学习太紧张。到7月放假，京都天气很热，院子里蚊子很多，我就去了东京，还住到高园寺老地方，房东也同意，还借行李给我用。我洗了洗就用。几乎天天去看松本先生或实藤先生，一个月时间，继续写《中国人留日教育史》。8月，我又回到京都去念书，到东方文化研究所去看书。这时才去看了一下京都二条城、火车博物馆。也到京极一带去看了看，高岛屋、大丸都去了。也观看了“能”，看不懂。倒是京都的酱菜、点心给我印象很深，很好吃。街上老百姓多是穿着和服，走在路上很漂亮。京都人走路也慢，说话古风犹存，女人尤甚，有贵族的味道。所以我在京都穿衣服也是规规矩矩。我主要是念书，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受惠于京都太多了。当然我之所以能够好好念书，一个是小学老师抓得紧，给我养成好习惯；一个就是京都逼得我用功。我那时相当勤快，早上5点多钟就起来，去大路町路上慢跑20分钟，回去念书，因为抄好的笔记要在上课前还同学。后来我写文章比较快，就得力于京都那段时光的学

习。

1941年12月一天，房东告诉我说，打起来了，日本把美国军舰打掉了，他问我怎么看？我说：“这很难说，是不是胜很难说。”他说：“日本一只脚在中国被拖住了。”我说：“这倒是事实。”日本知识分子对大本营说的一连串胜利，当时并不高兴，他也是如此。1942年2月初，我妹妹从上海来信，说日本兵从苏州河开过来了，我父亲的学校属于重庆国民政府的，不能再办下去，他就失业了，又生病，想把他送回家，希望我回家安排一下。我考虑我是长男，决定回上海去。于是就去东京，向松本先生辞行，也请他为我写的《中国人留日教育史》写一篇序言，他答应了，也写了，但我没有收到，恐怕是邮船沉掉了。我们还在院子里合影照相。我又去实藤先生处辞行。到长崎乘船回上海，这一段就结束了。

这一段，我总共在日本有20个月吧。我接触许多日本人，我得出的印象，不一定对，我的总结是：日本人单个时候，非常和气，非常有礼貌，这是他们所受中国儒教的影响，在实践上又比中国人深。当时中国人对人也是非常好的，彼此关心。日本人民的确很友好，可是三个日本人以上，就非常凶狠，这应该说是明治教育的力量，强调团结一致。你只要看一点，日本学生穿制服上街，一个人随便走，两个人走脚步就一致了。日本教育在这一点非常成功，所以那时日本军队这一集体，就成野兽了。可你要说单一个日本人本性的话，就一点也不坏，许多事做得比中国人还好。中国人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做到的很少，即使做了，也大打折扣。日本人尊重长辈，学校里也一样，新生见老生就站在一旁，现在依然如此。还有一点，日本人守法，红灯一亮就站住，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一样。所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第一点是教育。我去的时候，日本优

待老师，大学毕业就 45 元，当老师就更比其他工作多 5 元。小学老师西服是垫肩的，一看就知道。战后日本能够很快恢复起来，很重要是教育的关系。还有一点，不知你注意没有？日本人有个特性：从来不说“不”，而是说“研究”、“考虑”。日本人常常是佩服比他强大的人，你把他打倒了，他要向你鞠躬感谢；反过来，他要是把你打倒了，他是看不起你。1995 年 1 月《中央公论》杂志上，两个有名的日本教授对谈，里面说有几句：“在这次战争里，中国是战胜国，可是中国没有打败日本。”从这几句话，我就担心今后中日关系不容乐观，日本国民性至今还如此。这一点，我们对日本太不了解。

钟：我还深深感到日本人的劳动精神。

汪：我又想起一件趣事，那时日本有不少兵工厂，一般人都不知道。看电话本子上，全是数字代号。我那时不知道，我们的一位地下工作者要打听关西军工厂，他们有个办法，新电话本子上没有军工厂，但旧电话本子上有原厂名，两个本子一对就明白了。可是电话本子没有卖的，他曾托我买关西地区各地电话本子，我就帮他买了一堆旧电话本。此人后来在北京工作。

还有，韩国人、日本人都有个习惯，就是不用外国货。香烟骆驼牌、三五牌是外国货，他们不用，他们用自己的光牌香烟。讲民族性的话，这一点我们应该学习。

还有一点，京大教授指定参考书要你发言，不管你的看法与教授有多么大的不同，只要你的看法有理，比他的强，他马上就改正，我们叫“从善如流”。东京的小商人也是如此做事，如果他不认为错，就会硬到底。日本强大也就在于此。我搞了 50 年中日关系史，我觉得中国和日本，现在的差距不是 30 年、20 年，而是相差 50 年左右。

钟：您是更悲观一点。

汪：不是更悲观。上一次我也同竹内实教授讲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不容乐观。责任不全在中国，日本方面也有责任。刚才已经讲了，他们的主观意识非常强，他觉得对的一定坚持。可惜我们去留学的学生，真正好好念书的，不是很多，有些学生丢中国人的脸，给日本人看不起，结果到处给予为难。一般人不会有很远的眼光，日本人也不会个个都像松本先生那样，看到50年以后留学生是国家栋梁，他就是看眼前，我们那时，日本人看这些留学生，拿了钱到这儿不好好念书，还到吃茶店胡闹，是看不起的，觉得这个国家没有希望。我自己在日本受到的待遇是很有礼貌的，所以责任不能单算在日本头上。你说日本现在排外，的确排外，可是并不是对所有外国人都排斥，而是对不好好念书的人排斥。因为如此，几年前我见到上海回来的留学生，说日本小鬼，还是看不起我们，我们还是得抗日。这样又重复20—30年代我们走过的反日的老路，这样做很危险。日本人对日本有责任，中国人对中国有责任，只有这两个民族各自约束自己，尊重对方，将来才能改善关系。所以如果你光说要“理解”，是不够的，怎么去理解呢？首先你得理解自己吧？现在你对自己还都不理解！谈何容易。现在我们觉得去日本打工没什么不可以，可是你在日本的所作所为，违反日本风俗习惯，再干点坏事，这在中国也不允许，何况日本是法制很严的国家。这跟中国人老是骂：“高丽棒子卖白面”相似，实际没有几个人卖，可我们是全骂了。这也一样。这个问题，中日关系要改善，就要在这些方面下功夫。光说世代友好下去很容易，谁都会说，要在实际事情上做就难了。前一阵子日本政府对自费留学生要日语学校反签证，中国学生就有办法搞到手，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钟：我认为目前中日关系，有一点应该可以加以合作发展，就是社会科学各方面，双方合作研究。如果双方交流社科研究成果，肯定对民族有利。

汪：我是搞社会科学的，可是我们国家对社会科学还不太重视。日本人认为社会科学是打基础，打不好基础国家无法发展。你知不知道日本人看不起我们的成果？

钟：我知道。可这并不等于中国就没有好的成果和人才。只有比较才能有提高。

汪：中国有不少是吹的，什么什么世界第一。我见过我们的报纸上说日本每月花10几万日元留一个中国人，你知道，这点钱什么！我们的记者不了解日本，闹笑话。中日关系这样发展下去好不了。日本现在已经在经济大国基础上，向政治大国走了。当然军事大国它还不走，但等政治大国完成以后，当上联合国常务理事国之后，它马上就会想走军事大国之路的。它做军事大国很容易，军事大国来了以后，它是个小岛国，要资源没资源，要市场没市场，到时怎么办呢？还是要向外发展，最近的还是韩国，第二还是中国。

钟：我还想问一下，您后来与松本先生、实藤先生还有什么交往？

汪：实藤先生在50年代来中国时，我已经是右派了，不让他见我。他带给我的东西，本来要旅行社转交给我，旅行社不肯办。他聪明，就到新侨饭店邮局寄给我了。可是他送给我他的著作《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寄了三次，头两次我都没有收到，第三次寄是1979年了，我才收到了。头两次没收到，单位里还要我做检讨，责问我：“为什么不顾国格，找日本人要东西？”我说：“没有呀！”他说：“没有要？为什么日本人给你寄书来！”还有，不知道是谁寄一本《高丽》杂志给我，结果上面说是反动

杂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人家怎么会寄给你？”我一再检讨也通不过，总说我肯定知道，里面有阴谋。

实藤先生很长时间没有办法同我联系，他曾有一封信写给我的爱人，上面写道：“听说汪先生出了点事，所以信写给你，到以后汪先生能够收到信时，请给我来封信，汪先生知道我的地址。”可见他的心情。到1978年，《人民日报》有人来找我写文章，我说我还没有摘右派帽子，编辑说：“你早就摘了帽子，你不知道。”我说：“不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他就说：“你写一篇千把字的文章，我们给你发表。”我就把实藤惠秀和第三个儿子到埼玉县找黄遵宪笔谈冢碑的照片和其事写了，发表了。《人民日报》的确有用，不到半个月，日本方面来了七八封信，其中包括实藤惠秀先生的。他在信上说：“我以为你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没有再给你写信。现在看见你的文章和照片，知道一定是你本人写的，相片只有你有。请你告诉我你的近况。”那时环境宽了一点，我就写了回信，把我的大概情况告诉他。这样我也才搞清楚，是他前两次寄书来，要不然我的检讨也白费了。他又再寄第三次，还有一本《中日非友好历史》新书给我。

后来香港中文大学谭汝谦^①博士主持召开第一次“中日关系史学术会议”，实藤先生是贵宾，他提出要请我去参加会，谭博士说，知道汪先生，可是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情况？实藤先生告诉他，我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谭博士就用中国文化研究所陈所长名义，写信到中国社科院，邀请我去开会。那时社科院一些人还左得厉害呀，尽管胡乔木说：“可以去，没什么不可

^① 谭汝谦，1941年生。香港新亚书院毕业，获美国博士。1993年以前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后赴美国任教。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实藤惠秀原著）、《日本语言与日本文化》（金田一春彦原著）等。

以去的。”可是到世界史所又把我卡住了。

钟：这太遗憾了。

汪：实藤先生也说抱歉。我就问他能不能来中国？他说可以。我就让周雷请吉林社科院以《社会科学战线》的名义发函邀请他来中国，三上次男当团长，实藤当顾问。这一次，有人又同我打招呼，说你不通过×××那一关，谁也不行。结果又把实藤先生卡住了。怎么卡的呢？他们告诉实藤先生，说你到北京的话，也不能见到汪向荣先生。实藤先生就说：“不能见面的话，我去北京干什么？”他就没有来。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后来他的儿子来了。不过那些年我们间往返信件很多……

钟：如果双方的信没有丢的话，是否能够合成一部新的《大河内文书》？那是很有意义的。

汪：丢是没有丢掉。他的信都在实藤文库里保存，我也留有一部分。他写的信有些还复写留底，在文库里分别装订的，有我的专门一栏。后来，我曾在所里发牢骚说：“我这些信谁来审查也不怕。我们只是讲学术问题，没有讲别的，国家并没有禁止讨论学术。”

1986年我再去日本，实藤先生已经去世，我只有到他的坟上致敬了。我到图书馆他的文库去看望，看见好多书是当年我同他一起在旧书店买的。小川博先生说：“还有许多你写的信。”我说：“40年代的信，我都没有了。只留下一点明信片，红卫兵看不上，没有烧掉。”

钟：这是清末中日文化交流以来，又一次很有意义的交流。

汪：唉，没有什么。

那时实藤先生在研究中发现有点问题或弄不清时，就会写信来问我应该怎样解释？例如中国人的地名写在人名前面，可有时又同别号混在一起，他搞不清楚，我就写信告诉他。还有

他收集的游记，以及黄尊三日记中，都有各种问题，作为中国人是不难解决的。我们通信就是这些，这是真正文化交流，一点政治味道也没有。

唉。我很希望中日和平友好，日本的确是小岛上什么也没有，可也不能侵略呀。中国的技术现在还不行，而且教育也有问题，恐怕一二十年里上不去。如果中日之间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的话，这对两国、对东亚、对世界都有好处。

我在1984年左右在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做过一次报告，我说：“过去你们用枪炮来侵略我们，现在用电视机、录像机来侵略我们，是经济侵略。”我始终认为是经济侵略，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工业基础，我们的市场被人家占领，我们的民族工业怎么样去发展？如果我们的基础不打好，国家怎么样独立？而日本恰恰是，你要比他强，他才佩服你。

钟：后来，你回国后不久，又去了日本，又上学了吗？

汪：第二年我又到了京都，不过这一段牵涉太多，比较复杂，这次不能谈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